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传统与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

——分工、产权与市场*

白小虎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310028)

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我国市场经济先发地区的市场发源问题。地方性交易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存在多种贸易形式和分工结构,保持了连续的变迁,通过产权制度创新最终确立了制度化的市场经济。本文以浙江省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例,运用历史制度分析的方法,展现了当地经商农民与地方政府的产权博弈过程和“鸡毛换糖”的演化过程,并结合市场创业者的丰富事实,对传统与变迁的历史结构加以验证。

关键词: 义乌小商品市场 历史制度分析 分工 产权

我国市场经济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发育与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浙江是公认的“市场大省”,义乌又是浙江市场的典型,是什么使义乌成为市场经济的领先者?市场经济使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本文旨在从义乌的案例出发,在大跨度的历史结构转换中探究现代市场经济起源的历史轨迹和历史条件。

一、研究回顾、理论假说、分析框架的拓展

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内,研究建国以后的市场活动还不多见。向新等探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计划活动的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在国家陷入经济困难时期,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是国民经济有益的补充。¹徐建青概述了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商品市场的变化过程,认为尽管农村市场在趋于缩小,但没有完全关死,改革开放后成为流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²至于哪一种流通渠道能成为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徐文并没有最终的结论。因此,对建国后市场活动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解释市场活动的地位及其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作用。

吴承明指出中国市场的转化是从16世纪的明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的,但是我国真正有意识地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需要一系列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为和执行罚则。”有效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制度能促进贸易扩大、分工扩展与经济发展,政府界定和保护产权的效率高于私人的保护,政府提供非人格化的产权是现代产权制度的标志。市场交换活动是一个相对独立、长期延续的过程,即使在计划经济主导时代也是如此,但是制度化的市场活动开始于改革开放。因此,关于制度化市场活动的历史作用,关键在于说明产权制度的形成以及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支撑本文关于制度化市场活动的理论假说,即本土化的商业传统在现代产权制度变迁下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具体来讲包括以下两点:一、市场经济的确立,一套由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专门

* 本文受“当代浙商与专业市场制度:传统与变迁”课题资助,课题编号:06WZS01。

¹ 向新、苏少之:《1957—1978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计划经济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² 徐建青:《50年代农村商品市场变化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 参见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执行的产权制度是市场传统向现代制度化的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条件。二、交易传统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通过产权制度的创新实现了市场活动的制度化。

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并不是哪一个理论可以虚构的,需要有一个比较适合于再现历史进程中微观主体的行为以及产权制度非人格化过程的理论。历史制度分析(HIA)重要的代表人物格雷夫认为经济历史的核心问题是内在的策略性问题,¹从博弈论的策略问题角度来考察经济历史,可以帮助人们从经济主体的博弈行为或博弈策略的实施及相互影响来解释经济历史,包括经济制度的变迁与经济自身的发展。²历史制度分析首要的问题是在于对制度的理解,在格雷夫看来制度是对微观主体行为实施的约束,是博弈行为的均衡。”历史的制度分析注重历史事件及其内在联系,注重复杂的事件与行为主体的交互影响。

白小虎解释了浙江义乌的“鸡毛换糖”传统经过若干个专业化分工结构的过渡,从个别的商贩转变为组织化制度化的商帮过程。³“鸡毛换糖”演变为专业化贸易,农副商兼业的农民转变为专业化商人,个体商贩成为有合法产权与地位的经营户、商行、贸易公司,在浙江省中部的义乌保留了历经清、民国与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若干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本文的分析框架将延续这一工作,从两个方面来展开历史制度分析,一是以产权作为另一条线索进行历史制度分析,分析作为历史过程中微观主体对策行为的均衡结果——产权及其保护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促使传统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二是以专业化分工的结构演化作为一条线索,展示产权制度对传统演变的影响,刻画近200年演变的历史结构,当然着重分析建国后“鸡毛换糖”曲折的结构演化。

二、传统与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

(一) 市场活动的产权博弈与产权制度的演变

白小虎较为完整地描述和分析了小商品交换传统——“鸡毛换糖”成为专业化、组织化交换活动的过程,“敲糖帮”的坐商、行商自发形成了内部各项制度,如等级分成的“公费”制度、实物借贷和货币结算清偿制度等。但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断了市场活动的演化,农民商贩、商人群体为了争取谋生手段,与相关政府部门展开了博弈行为,导致了产权制度的演变,同时交易传统和分工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非正式产权制度:与生产队的博弈均衡。

解放前的“敲糖帮”是一个民间的帮会组织,建国后被解散,传统的交易活动也因此萎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严格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农村集市贸易也在控制之列。“货郎担”需要到集市上出售农副产品,随时有可能被“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简称)人员抓获,没收所得并处以惩罚。“货郎担”的私人产权不具合法性而被任意侵犯,但他们实施了一套逃避计划经济管制、自我保护私人产权的机制。

途径之一是恢复古老的交易传统。交换对象仅仅局限于鸡毛等废旧物品,主要用糖饼,偶尔带一部分从集贸市场偷偷采购的小商品来交换,大大增加了工商主管部门的管理难度,降低了私产被侵犯的风险。

途径之二是寻找生产队的保护。“鸡毛换糖”与集体农业息息相关,是义乌农业生产和社队企业的需要,农民外出得到了生产队的支持和公社的默许。他们用交换来的下脚鸡毛为生产队提供肥料,

¹ 阿弗纳·格雷夫:《经济历史与博弈论概览》,《比较》第2期,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² 史晋川:《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台州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³ 阿弗纳·格雷夫:《历史制度分析:从经济史视角研究制度问题的新进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5期。

⁴ “鸡毛换糖”是浙江义乌自清代以来的一种运用土产来换取鸡毛等废旧物品,并通过出售废旧物品获取货币收入的物物交换传统,在本文中代指由其演化出的多种经商方式,“货郎担”是其从业者的俗称,具体参见白小虎《交换专业化与组织化的理论与历史考证:以义乌的“鸡毛换糖”、“敲糖帮”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用卖鸡毛所得的货币上交生产队并按一定的比例折算成集体农业劳动的工分。作为交换,生产队和公社则为农民外出换糖开具证明。通过农民与生产队合作的制度安排,在小范围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内,私人的产权和市场交易活动取得了合法性,形成了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产权规则——生产队打证明、公社发放证件,这一条默认的规则从个别生产队推广到了义乌全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鸡毛换糖”成了集体农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集体农业也成为其产权保护伞。

2、管制放松:与管制部门的博弈均衡。

“鸡毛换糖”一度被怀疑为“投机倒把”,但是对“鸡毛换糖”的管制一直很难奏效。一是由于所谓“投机倒把”本身并没有确定的对象,随着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变动而变动,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要由身处第一线的“打办”人员来决定。打办人员不时放松了对“鸡毛换糖”的管制,减少对私产的侵犯。其次,“鸡毛换糖”依靠流动经营规避管制,即使被没收,损失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管制“鸡毛换糖”的成本在加大,收益在减少;而对于“鸡毛换糖”的一方,规避管制的成本在减少,而规避管制的收益却在不断增加。在动态的过程中,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久而久之,“打办”对“鸡毛换糖”恰如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方政府明确宣布开放农村集贸市场,为寄身于集贸市场的“鸡毛换糖”增加了一道保护伞,正常的活动不再列为“打办”打击的对象。

3、公办小商品市场:基层部门创新与化解风险的博弈均衡。

传统的农副兼业的“鸡毛换糖”是半专业化的分工,要向市场经济下的专业化分工演变,非正式产权必须从根本上得到承认,转化为制度化的批发交易活动。卷入小商品贸易分工的不仅有从事批发、零售的农民,还包括批发市场的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区工商所、县工商局逐渐接受农民商人的市场活动;县委县政府的价值判断受到工商管理部的影响,不至于贸然发布对地下市场的“格杀令”;地市、省级的主管部门不断收到下级的请示,不作明确表态。真正要使得制度创新能立于历史舞台,底层和基层的利益相关团体的行动是最关键的,他们的合力将会影响到决策层的政治意志并迫使其承认创新的合法性。县委领导确立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基调,在政策边缘加以限制性发展。基层干部在上级主管领导的默许下,大胆地制订了整顿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方案。

县委是直接承担创新风险的基层部门,默认是化解制度创新的政治风险的策略。工商所是直接执行政策的基层部门,通过最基层的试验是风险最小的策略。在县委县府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1982年8月25日以稠城镇和城阳工商所的名义联合发布了整顿小商品市场的通告,自行决定于9月5日开放小百货市场,给每一个经商者办理工商登记,核发摊位证。小百货市场作为一个存在的事实到最终得到正式承认,作为微观主体博弈均衡结果的产权制度的确立是经过漫长的过程。

(二) 市场活动的分工结构演变

1、产权对分工结构的影响。

产权博弈的分析展示了市场主体有强烈的自我保护财产和收入的动机,即使在正规制度严重打击下,也在积极实施各种策略来影响政府部门,最终推动了正式产权制度的建立。我们也看到了在产权受到不同程度保护的同时,市场活动的分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产权制度是分工结构演进的外生制约。纵观“鸡毛换糖”演变的历史,在产权效率这一维度可以大致划分成两个区间,一是私人产权和私人经济活动不受侵犯、或者受到较好保护的制度,产权效率较高,市场交换活动可以公开进行,为了通俗起见,名为“公开状态”;另一种状态下财产权利制度禁止私人产权和私人经济活动,市场主体随时都有可能遭受侵犯,只能被动地保护自己,以隐蔽的方式来规避各种可能的侵犯,那么产权效率较低,故名为“地下状态”。市场活动(其实是分工结构)演化的交易费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产权,如果产权保护得越充分,自我保护的支出就越低,市场活动的范围就越广。公开状态和地下状态是“鸡毛换糖”传统在演变过程中两种产权状态,是划分分工结构演变阶段的重要依据。

2、分工结构的演变。

分工结构演化的交易费用另一部分直接与交易方式相关,例如交易的媒介、规模等,如货币为媒介的交易费用就明显低于物物交换。交易费用越低,交易效率则越高。交易效率是分工结构演进的内在因素。根据交易媒介和交易方式将“鸡毛换糖”的传统分为三个区间,在第一个区间是没有货币,而且交换媒介自给;在第二个区间交换媒介社会化,也可以通过货币来作为媒介,是专业化零售交易;在第三个区间零售商的规模更大、交易范围更集中,是以货币为媒介的批发交易。这三个区间从低到高的演进是受交易媒介、交易专业化的因素驱使的,是能连续、渐进的变迁。

通过产权和交易方式两个维度的组合,划分出6个区间来反映“鸡毛换糖”的传统与变迁中相对独立的分工结构(如图1所示)。在建国之前,私人产权是合法的,但交易方式比较原始,从传统副业演变到敲糖帮时代的大规模商业活动。建国后,私人产权和私人活动受到限制,进而蜕变为当地农民偷偷摸摸从事的地下副业,由于得到生产队非正式的保护,演变为非正式地下零售。改革开放前夕,经济管制相对放松,“鸡毛换糖”的规模扩大成地下批发,只有当得到地方政府的公开承认和保护,才进入了公办小百货市场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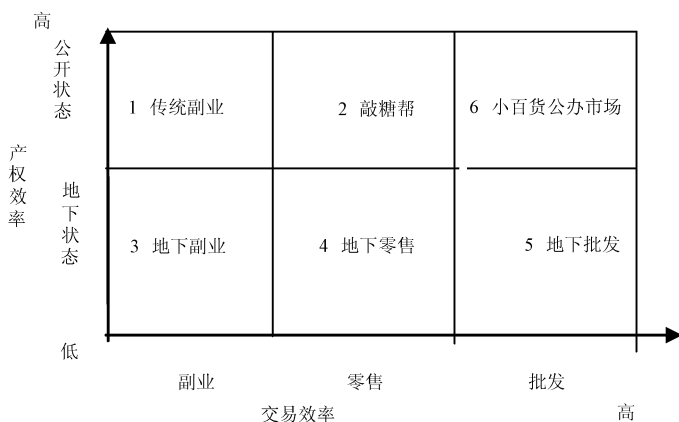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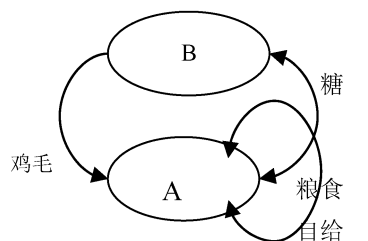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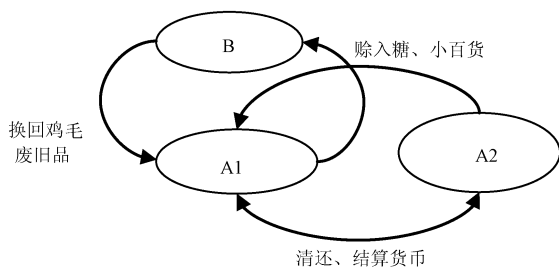
图1 “鸡毛换糖”的6个分工阶段

就交易效率而言,传统副业和地下副业的分工结构没有本质的区别,都需要用糖来换取鸡毛、杂肥,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通过农闲时节的交换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剩余农业劳动的配置效率。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粮食由“工分”所替代(如图2所示)。传统副业和地下副业都在各自的产权制度背景下演进成专业化的零售贸易,分工结构基本相同,但毕竟由于社会的分工水平和货币收入水平不同,前者由于缺乏货币资本,因而发展出了一套由行商和坐商组成的敲糖帮组织,通过帮会制度将行商专业化贸易的人力资本与坐商的货币资本相结合,化解了行商的专业化风险(如图3)。后者由于货币和社会分工水平(集贸市场)的提高,生产队工分的货币化、鸡毛加工厂的货币、集贸市场以货币为媒介的小百货,都有助于化解个人专业化的风险(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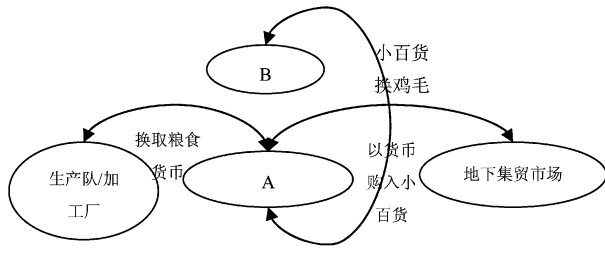


A: 专业商人的前身 B: 一般消费者
图2 副业的分工结构图

地下批发与公办小百货市场的分工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见图5),是由地下零售内生演进的。地下零售贸易的大规模兴起为批发贸易提供了必要的市场规模,化解了批发的专业化风险。批发商或从国有集体商业渠道扩大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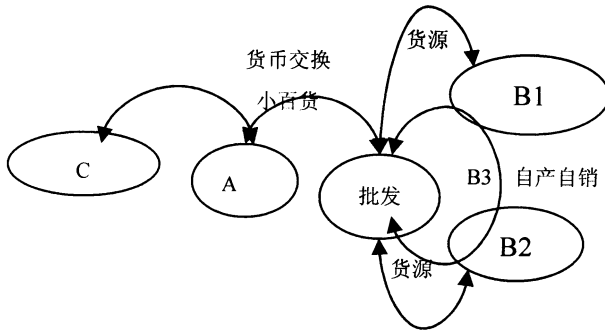


A1、A2: 敲糖帮之行商与坐商 B: 消费者
图3 敲糖帮的分工结构图



A: 地下零售交易者 B: 一般消费者

图 4 地下零售的分工结构图



A: 流动的“鸡毛换糖” B1、B2: 国有集体商业渠道、企业 B3: 自产自销 C: 消费者

图 5 小百货批发的分工结构图

源,或直接从周边的城乡企业取得货源,成为独立于计划经济流通渠道的专业化批发商。前后两个阶段的区别在于产权效率,产权制度创新取得成功后,地方政府率先开放了当时还是政策禁区的批发贸易,实现了制度化的市场活动。

三、传统与变迁的历史结构

(一) 分工结构与“鸡毛换糖”传统的历史结构

“鸡毛换糖”传统经历了 6 种状态的变迁,组成了完整的演化过程,从本土化的贸易传统演变到现代产权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走了一个“Z”字形的曲折过程。小商品交易传统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经历了多次变迁,但是制度化的市场活动仅仅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 20 多年的时间。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不仅从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动刻画出传统变迁过程中产权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市场活动的分工结构演化的影响,使得最早的“鸡毛换糖”与改革开放前后的小商品贸易活动建立了结构性的联系。

根据产权制度的结构性变迁,在“传统与变迁”历时 200 百年的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中分成若干个阶段,第一个是解放前的“敲糖帮”时代,包括个人分散的敲糖副业和通过“敲糖帮”有组织的交易;第二个是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敲糖帮组织瓦解,在“鸡毛换糖”掩护之下开展小百货零售活动;第三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变迁,包括大规模的“小百货、糖换鸡毛杂肥”的交换活动、地下批发市场以及开放小百货市场等若干事件。

本文已经对分工结构在特定产权制度下的演化做了逻辑上推理,而且在交易效率、产权效率两个重要的变量维度上,将“传统与变迁”划分出 6 种前后相关但又明显不同的结构,或者称 6 个结构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传统副业”、“敲糖帮”两个结构位于第一阶段,“地下副业”、“地下零售”两个结构位于第二阶段,“地下批发”、“公办小商品市场”两个结构位于第三阶段。变迁可能发生在两个方向,一是在同一产权制度下的交易效率的提高,二是由于不同产权制度而引起的变化。第二个阶段承上启下,同时兼有产权和分工结构的变迁,因此最为关键。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发生了产权制度的

强制性变迁,导致交易方式的倒退,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发生交易方式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同时国家政策出现松动预示着产权制度方向的变迁。在该阶段下从事副业交换活动的农民商贩,很可能在下阶段继续从事经商活动,交易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从地下的零售方式发展转变为地下批发商,直至最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办小百货市场的第一代经营者。

(二) 小商品市场创业者的历史变迁

三个阶段构成了传统与变迁连续的历史结构,每一个阶段还由若干个不同分工结构的时期组成。第二阶段事关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如果要验证“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这一假说,就必须有力地说明其与第一、第三阶段的前后相关性。公办小商品市场第一代创业者的活动基本上集中在第二阶段,经历了建国后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大变迁,从最原始的副业做起,最终成为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第一批经营者。根据现有资料,本案例收集到了20位第一代市场成立时的创业者,¹而据历史资料显示,当时拥有正式摊位证的个体工商户也不过二三百人。²本文选取的20位创业者,大多是市场的骨干,担任个体户协会、市场党组织、市场自治组织的负责人,通过他们来考察200多批发市场最早的经营者的情况有相当的代表性。

第二阶段与前后两个阶段的联系需要考察20个创业者代表多大程度上受“鸡毛换糖的传统”的影响,同时如何实现向“小百货批发商”的转变,本文从籍地、从商经历、行商路线、经营种类、经营资本这五个方面来验证传统与变迁的相关性。所谓籍地是指经商者的来源地,从商经历主要来描述经营者在不同时期从事“鸡毛换糖”的方式及其变化,经商者的行商路线,反映了“鸡毛换糖”的市场范围,经营品种即不同时期主要的交换对象,可以反映出市场活动的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经营资本主要考察经商活动中资本投入的货币化程度以及资本的来源。

“鸡毛换糖”的传统区在以廿三里为中心的义乌东北农村,包括廿三里、下骆宅、华溪、尚经、平畴、福田等十几个乡村。”稠城镇有一部分接近传统的义东北,也是受“鸡毛换糖”影响比较大的区域,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更好,廿三里的地下批发市场一部分转移到了稠城镇。20个样本中来自义东北的有10位,其中有4位就来自于廿三里,6位来自稠城镇,其他4位暂时不详,但回忆录中都提及“鸡毛换糖”传统对自己的影响。地下副业阶段的从业者都来自义东北,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地下零售和批发阶段,经营者来自更多的周边地区,以不同的方式经营“鸡毛换糖”。

第二阶段的结构有地下副业、地下零售、地下批发和公开市场这四种情况,其中20世纪60年代从事副业的有5位,70年代从事地下零售的有8位,且其中有4位的经营活动是前后连续的。70年代末从事地下批发的有9位,其中有4位也从事过地下副业。1982年成为第一代市场经营者的有17位,其中前后连续的有9位,新加入者有8位。即使不运用复杂的统计分析,也能看出“鸡毛换糖”的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市场活动前后连续的人数在增加。每一个时期都不断有经营者加入,但也不乏长期从事并不断改变经营方式的经营者,可见这四个状态是一个连续变迁的过程。

江西、湖南、安徽、江苏、山东是“敲糖帮”主要的活动区域。³解放后市场范围缩小了许多,只在义乌周边县市活动,后来专业化的活动有所扩大,在地下批发市场兴起后,市场范围扩大到了浙江周边省份,江西是最有代表性的市场区域。在地下副业时期有4位到过江西等地,地下零售时期新增了4位,都在传统的“鸡毛换糖”区域活动。在地下零售时期,持“小百货、糖换鸡毛杂肥”许可证的农民

¹ 20个市场先驱者的相关资料,如不加特殊说明,都来自于《小商品 大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创业者回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² 义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九八一年度工作总结和今年度的几项主要工作意见”,1982年1月。

³ 傅桂山:《我参与市场开放的前后》,摘自《小商品 大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创业者回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⁴ 胡琦:《义乌的“敲糖帮”》,《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卷,1982年版。

活跃在金华、衢州、绍兴、杭州等地,以及外省的江西、安徽、福建等地¹。就市场范围和路线来看,交换传统在义乌得到保留和延续,前后200年间历史高度相似,江西等传统的“鸡毛换糖”市场在建国后很容易接受世代相传的“货郎担”,也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早期最主要的目标市场。但是地下批发兴起后,市场活动范围明显发生了改变。有14位创业者到城乡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组织货源。经商活动前后连续的7位批发贸易创业者,基本都从传统区域转向了沿海城乡工业发达的地区。

早期的交换物除了糖之外,还有少量面向妇女、儿童的针线、什物、金华火腿、义乌蜜枣等。²地下副业时期从业者还从集市贸易、供销社购入缝衣针、发夹、钮扣等小百货。1980年前后,零售小百货主要有两类,一是家庭作坊加工的日用品;二是从商业供销部门批发的日用商品。地下零售时期的商品仍旧带有很浓厚的“鸡毛换糖”的色彩。不过当时政府已经发放了“小百货换鸡毛杂肥”的许可证,糖已经逐渐退出了主要的交换范围,小百货已经成为了主流。随着经营方式的转变,转为地下批发为主后,商品种类开始有所改变,传统土产和家用什物逐渐淡出,大量出现的是直接从国有集体商业渠道和城乡工业企业组织的工业品。1980—1982年间,外出“鸡毛换糖”用纽扣、鞋带、别针、缝衣针、拉链、橡皮筋、小包锁等,这些货源都是经营者从江苏、上海等地厂家直接进货的。³在市场正式开放后,批发商品基本上还继承了满足家庭日用的传统,但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在数量、质量、款式上大有改进。综上所述,从“鸡毛换糖”到小百货市场,经营品种在传统与变迁的各个时期有着较强的延续性。

交换活动需要交换媒介,交换媒介从实物到货币经历了一个货币化的过程。在社会分工水平很低、消费者货币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敲糖帮”提供了一套替代货币资本的制度,使得分工结构从副业演进到专业化的零售。地下副业受到了严格的管制,但由于社会分工水平和消费者货币收入有所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有助于逃避管制。地下副业提高了粮食产量,增加了农副业的偶然性货币收入,还从鸡毛加工厂获得一部分货币收入,以此作为零售的货币资本。1978年开放城乡集贸市场以后,地下批发时期以货币为媒介市场迅速扩大,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才能从事专业化批发贸易。综上所述,货币资本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传统是如何被继承又是如何被突破的过程。在20个样本中地下副业和零售业时期从业有8位,其中有7位以农副业收入作为投入,平均35元;地下批发和正式市场时期的经营者分别有9位和17位,其中12位以农业收入、朋友借贷赠送、征地补偿、信用社借贷等作为投入,平均达到400元,而且其中有7位通过借贷。

第二阶段是承上启下的,既包含对传统的继承,同时也在不断地突破传统。6个时期中,前三个时段考察对传统的延续性,旨在说明市场经济的本源在本土化的贸易传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后三个时段考察对传统的突破性,旨在说明产权有效保护后交易效率提高推动市场范围扩展对现代变迁的重要影响。

前三个时期中,义东北是经营者最集中的地域,随着时间的递延,在总体人数增加的情况下,来自于义东北的比重逐年递减,而且在后三个时期递减尤为明显。地下副业与传统在经营方式上没有根本差别,以地下副业的人数为基点,样本中从事过地下副业的人数比较稳定,但是在经商人数上升的过程中比重不断降低,表明从业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改进经营方式。传统的目标市场在200年间一直比较稳定,以江西最为典型,货源市场主要在义乌本地。地下副业和地下零售时期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市场范围;但是在进入批发后,主要的活动范围发生转移,从传统的目标市场转向了货源市场。小百货的品种、工艺、数量在不同时期有很大差别,在前三个时期商品比较原始简单,个人

¹ 傅桂山:《我参与市场开放的前后》,载《小商品大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创业者回忆》,第23页。

² 义乌县志编纂委员会:《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³ 冯爱倩口述:《小商品市场的先行者》,载《小商品大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创业者回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自制、本地土产的专业化程度就低,地下批发时期从本省、外省生产企业进货,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副业和地下状态下的经营方式。以传统副业为起点,资本投入基本以人力为主,但不同时期的资本投入中人力资本的比重不同。在地下零售时段,有农副业生产劳动积累的货币资本投入,因此是过去的人力资本积累。进入批发时期,从业者除自己的劳动积蓄外,还必须借贷 10 倍左右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的比重大大降低。可见货币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和媒介作用,突破了传统的交易方式。

地下副业和地下零售时期在籍地、活动范围、经营品种、经营方式等方面与传统有着很强的延续性;进入批发时段后,市场范围、经营品种、资本投入等明显突破了传统,表明传统发生了显著的变迁。显然,改革开放后,政府管制政策的放松,集贸市场的开放,乃至对批发市场与个体市场经营活动的公开性、制度化的承认与支持,推动了古老的贸易传统实现向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转变。特别是公办小商品市场开放后,专业批发是制度化的市场活动,更多的人加入了批发市场,传统的“鸡毛换糖”渐渐从现代市场活动中隐退。

结 语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鸡毛换糖”的传统,历史的曲折变迁反映了分工结构演变与产权制度变迁相互影响的过程。1982年9月,由本地传统孕育的地下小商品市场成为由稠城镇和城阳区工商所合办的公办市场,这实质上是一次产权制度的变迁,最终解决了产权的保护问题,彻底解决了私人降低产权成本的努力,从而完成了“鸡毛换糖”自“敲糖帮”解散以来几十年间蜕变、复苏进而获得新生的历史使命。本文在历史制度分析的框架下展示了义乌商业传统近 200 年的变迁过程,20 位市场创业者代表的创业历程展示了继承传统和突破创新的过程,旨在表明现代市场经济可以在传统的专业化分工中萌芽,并在产权制度创新中最终确立。